

思问录

主编 董治安
译注 张忠纲
王新春
刘心明

中国 儒哲
十大 名著

原著

王夫之

山东友谊出版社

思问录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译注 王新春
刘心明



原著

王夫之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思问录/ (清) 王夫之著; 王新春, 刘心明译注.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董治安, 张忠纲主编)

ISBN 7-80642-307-9

I. 思… II. ①王… ②王… ③刘… III. ①思问录-注释
②思问录-译文 IV. B24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0481 号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

主编 董治安 张忠纲

思 问 录

原著 王夫之

译注 王新春 刘心明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3000

ISBN 7-80642-307-9/I·67

全套定价: 256.00 元

《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编委会

主 编：董治安 张忠纲

副主编：董 时 刘凤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凤泉 牟瑞平 张茂华

张忠纲 朋 星 姚文瑞

鹿风芍 董 时 董治安



儒学，源远流长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文化的结晶。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儒家思想的精华。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国儒学十大名著》丛书。

从汗牛充栋的儒学典籍中，我们精选出儒学思想家的十部著名著作，加以译注。这十部著作作为《论语》、《孟子》、《荀子》、《春秋繁露》、《法言》、《近思录》、《朱子性理语类》、《象山语录》、《传习录》、《思问录》。这些著作在儒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占有重要地位，曾经对中国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无论从理论价值，还是从社会作用来看，它们都无疑是儒学著作的典范代表。

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在注释过程中，编者态度严谨，付出了很大努力。首先，选择善本，对原文作了认真校勘；其次，尽可能吸收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力争做到注释详尽，译语精当；此外，书前引言和篇前题解，撮其旨意，也颇能便利读者。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儒学热正在世界范围内升温。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正在汇聚到世界现代文化的洪流中，这对全人类的

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相信，《中国儒哲十大名著》的出版，对于儒学进一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年12月



《思问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王夫之的重要著作，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可谓王夫之哲学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纲，因而是全面研究和把握王夫之学术识见、人生理念不可或缺的资料，对于深入理解儒学也具有独特价值。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今属湖南）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明清之际著名哲学家、思想家，疏理、传承与光大儒家学术文化生命的一代宗师。晚年隐居于湖南湘水之西的石船山（位于今湖南衡阳金兰乡），自称船山遗老，并最终卒于此，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夫之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父亲王朝聘、叔父王延聘学问渊博，长兄王介之也学养深厚。夫之从小就跟随父兄读《四书》、《五经》、百家诸子的著述以及汉赋、唐诗等，文名重于乡里，但参加科举考试却一再落第，直至二十四岁第四次参加乡试，才与长兄介之考中举人。同年末，与兄介之北上，准备进京参加会试，未果而返。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义军首领张献忠攻克衡阳，礼聘他与长兄介之参加所立政权，夫之先是与兄逃匿，后又因闻父被义军所执而斫（li，用刀划破）面伤腕，让人抬至义军驻地，予以拒绝。清顺治五年（1648年），夫之与他在衡阳举兵抗清，不久便败。次年，南下投奔桂王朱由榔所建立

的永历小朝廷，后被桂林抗清名将瞿式耜所推荐而担任了逃至梧州的永历小朝廷的行人司行人一职。他上书陈言改革弊政，遭到时任东阁大学士的王化澄的打击迫害，几近丧失掉性命。不得已，投依瞿式耜。桂林失守，瞿式耜死难。为了躲避清军的“剃发令”，夫之开始了其流亡生涯，先后流离转徙于零陵、常宁（都在今湖南南部）的荒山野岭之间，自称瑶人，居住瑶洞，生活极其艰难。顺治十四年（1657年），才得以返回衡阳老家，隐居深山，从事著述，而终其一生。

夫之一生著述颇丰，约有一百余种，四百多卷，八百多万字。其中，最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诗广传》、《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宋论》、《张子正蒙注》、《思问录》、《俟解》、《黄书》、《噩梦》、《搔首问》、《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楚辞通释》等。近年来，由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十六册，是迄今收录传世的夫之著作最为全面、点校也甚为允当的夫之著作全集本。在夫之的众多著作中，《张子正蒙注》是系统诠释和发挥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一书的重要哲学著作，《思问录》则可与其相互发明。

《思问录》分为内篇一卷，外篇一卷。

本书书名的由来，大概取自于《论语·为政》所载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告子上》所载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周易》中《乾卦》九二爻《文言传》“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诸文及其意蕴。思谓己之所思，问谓己之所问。只是己之所问并非指请问于他人，而是指自己就某些存有疑问的问题向自己发问，促使自己就此进行深入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正确回答。综观全

书，也可知晓，本书的确是夫之当年针对自己之所疑所思所作的笔记体著述，它几乎涵盖了当时学术文化的各个领域。因而，透过本书，人们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夫之的学术关怀、人生关怀及其相应的学术识见。也正因此，我们才说本书堪称夫之哲学文化思想的一个总纲。

本书有内篇与外篇之分，内篇的内容具有高度的哲学性，外篇则主要涉及到了一些具体学科、具体学术领域的具体问题。通观内外篇，我们可以发现，在《思问录》中，夫之阐发了如下的思想内容：

首先，在总体宇宙哲学方面，夫之远承《周易》，尤其是《易传》变动不居、生生不息的宇宙论，近接北宋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见，指出，宇宙万有的终极本原是无形无象的气，气分化为阴阳，阴阳之气形成天地，天地之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产生出万物。他改造了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范畴，将它们视为与太虚内涵相近乃至完全相同的范畴，认为三者指的都是无形无象的宇宙本然状态和无形无象的气的本然状态。在此基础上，他着重阐发了由宇宙本然状态的太虚、无极、太极开始的宇宙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以及由此所促成的宇宙万有的生生日新。他论此所言运动的绝对性与静止的相对性道：“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废然之静，则是息矣。”（《内篇》1.8）息指的是丝毫不包含运动的绝对静止。这就排除了绝对静止的存在。又说：“阴阳动静，故莫不然。阳含静德，故方动而静；阴储动能，故方静而动。故曰：动静无端。”（《外篇》2.5）这又指明了运动与静止的相互渗透、相互涵摄和相互依赖。他论此所言宇宙万有的生生日新道：“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外篇》

2.12) 又称：“张子曰：‘日月之形，万古不变。’形者，言其规模仪象也，非谓质也。质日代而形如一，无恒器而有恒道也。江河之水今犹古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镫烛之光昨犹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火近而易知，日月远而不察耳。爪发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知也；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则疑今兹之日月为邃古之日月，今兹之肌肉为初生之肌肉，恶足以语日新之化哉！”（《外篇》2.53）由此，夫之揭示了一个以气化日新为基本内容的总体宇宙图景。气分化为阴阳，阴阳分化为水、火、木、金、土五行。自战国时代起，谈论五行者，每每要论及五行间的生克制化关系。就此，夫之主张，五行之间，只存在相益互补的关系，而不存在相互克制的关系。他说：“五行无相克之理，言克者，术家之肤见也。”（《内篇》1.146）又说：“五行生克之说，但言其气之变通，性之互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敌也。克，能也，制也，效能于彼，制而成之。”（《外篇》2.33）相关论述尚有其他一些，不再赘述。为了揭明宇宙万有运动不息、生化日新的内在动源，夫之还进一步继承并阐扬了张载“一物两体”的思想，开了事物内部所存在的两个相互对待的方面，它们的相互对待、相互排拒、彼消此长以及相互依赖，促成了事物的流动变化、生生日新。他称：“‘两端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也。’（张子）实不窒虚，知虚之皆实。静者静动，非不动也。聚于此者散于彼，散于此者聚于彼。浊入清而体清，清入浊而妙浊。而后知其一也，非合两而以一为之纽也。”（《内篇》1.59）

在析论气生化宇宙万有及宇宙万有流变不息的日新之化的过程中，夫之还特别指出，气的生化运动存在着一定的法则或规律，万有的存在与变化同样存在着一定的法则或规律，法则或规

律不在气或万有之外，而就存在于气或万有之中，依存于气或万有，并具体展现于气的生化运动或万有的流动变化过程中。他说：“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内篇》1.109）又说：“统此一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则道在其中矣。”（《内篇》1.150）器，指的是有形有象的事物，指的是事物有形有象的一面；道，指的是事物形而上的法则或规律。

其次，在人们的识见、认识问题上，夫之指出，人之外的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客观而真实的存在，它们的存在，不以人的识见为转移。在认识外物的过程中，人需借助自己的耳目感官，但是，耳目感官是存在巨大局限性的，借助它们，不可能实现对于事物的全面把握，如要实现对于事物的全面把握，就必须切实注意充分发挥心官的作用。因此，他称：“目所不见，非无色也；耳所不闻，非无声也。”（《内篇》1.2）又称：“目所不见之有色，耳所不闻之有声，言所不及之有义，小体之小也。至于心，而不得矣。思之所不至，而有理未思焉耳。”（《内篇》1.3）

再者，在社会人生领域，夫之先是着眼于人之为人的人性，论述了他的人性论观点。夫之人性论的独到之处，在于他继承并进一步阐发了伪《古文尚书·商书·太甲》“习与性成”的思想，指出，人性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习惯的形成、所处习俗的影响以及自身作为的情形和人生阅历、生命感悟的变化而一直处在开放式的不间断的生成过程之中，这一生成过程，直至人的生命历程的结束才会宣布终结。他说：“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真。”（《内篇》1.73）又说：“孩提始知笑，旋知爱亲，长始知言，旋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养之，则耄期而受命。”（《内篇》1.93）这些论述，显然可与他在《尚书引义·太甲

二》所作的如下论阐相互发明：“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形，不受损益也哉！”这一点已为学界所熟知。为学界所忽视抑或有意回避的，则是夫之在人性论问题上所阐发的人的本然之性是善的观点。在论及人的本然之性时，夫之继承、整合、融铸并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孟子性善的学说、《周易·系辞上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学见以及张载《正蒙·乾称》“天地之帅，吾其性”的识见，明确主张，人自天那里禀受了刚健的品格，自地那里禀受了柔顺的品格，因而形成了自己纯然至善的本然之性，这一本然之性，是人自觉完善、提升自我，涵养成形而上的内在崇高人文德性，达成高品位的精神境界、生命境界与人生境界，实现形而下的现实人生的价值圆满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终极资源。自觉意识到这一资源，进而积极主动地豁显这一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一资源的功用，社会人生就会充满无限希望。他说：“天地之帅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则志壹动气，斟酌饱满，以成乎人道之大用。”（《内篇》1.34）又说：“‘尽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后知性之善也。”（《内篇》1.72）又称：“有善者，性之体也；无恶者，性之用也。”（《内篇》1.142）“性之体”，就是人性的本体或本然。在他看来，有志于正大的人文之仁善的人，就应当反身内求，充分开掘、充扩和发扬光大作为人之为人、人之所以为人终极源头处的人的本然之性的善这一宝贵资源：“志于仁者，反诸己而从其源也。”（《内篇》1.144）在夫之看来，人的本然之性的善，从人生日用中人们的一些具体作为就可得到明确的验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性

之善征矣。”（《内篇》1.1）而只要人们自觉而又坚定地树立起仁善的人文心志，就会使自己本然之性的善这一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在具体回应现实社会人生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中的一切和形而下的实际领域中的一切时，令这一资源得以豁显、升华并真正实现其功用，从而圆满达成通体有善无恶的理想人生目标：“‘苟志于仁，无恶也。’物之感，己之欲，各归其所，则皆见其顺而不逾矩，奚恶之有！灼然见其无恶，则推之好勇、好货、好色而皆可善，无有所谓恶也。疑恶之所自生以疑性者，从恶而测之尔。志于仁而无恶，安有恶之所从生而别为一本哉！”（《内篇》1.140）在此基础上，夫之又立足于观照角度的不同，将人的本然之性区分为性之理与性之德两个方面，并从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出发，对人的本然之性的内蕴作了进一步的全面剖析，指出，就这两个方面而言，人关键是要基于自己本然之性中的善的资源，自觉涵养起醇厚的人文德性，挺显人文德性主体之自我，而只有真正挺显起人文德性主体之自我，人才会成为一德性化的生命人格，顺利成就自己人生的德与业，而人人如此，社会人生的光明前途就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反之，如若人的人文德性主体之自我不能挺显，人自身毫无希望可言，社会人生也会毫无希望可言。他说：“有性之理，有性之德。性之理者，吾性之理即天地万物之理，论其所自受，因天因物而仁、义、礼、知浑然大公，不容以我私之也；性之德者，吾既得之于天，而人道立，斯以统天而首出万物，论其所既受，既在我矣，惟当体之知能不为妄，而知、仁、勇之性情功效效乎志以为撰，必实有我以受天地万物之归，无我则无所凝矣。”（《内篇》1.99）此外，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本然之性中的善的资源，加强人们的人文德性修养，挺显各自的人文德性主体之自我，夫之还开示了一系列涵养修为方法。在夫之所开示的这一系列方法中，最为重要的，

是他所重新阐释的《礼记·中庸》“曲能有诚”的理念和宋明理学家“主静”、“主敬”、“主一”方法。在他看来，“曲能有诚”，就是要使人们在正大人文之道所流经的每一个时点或时段上，都能够保有一颗真诚之心，并认为，“‘曲能有诚’，圣功专直之通也”（《内篇》1.90）。而他对另外三种德性涵养修为方法所作的新阐释是：“主静，以言乎其时也；主敬，以言乎其气象也；主一，以言乎其量也。摄耳目之官以听于心，盈气以充志，旁行于理之所昭著而不流，雷雨之动满盈而不先时以发，三者之同功也。”（《内篇》1.92）

而对于社会历史整体的演变，夫之则大致提出了一种历史逐步进化、文明渐次进步的基本观点。他称：“故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啍啍，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外篇》2.77）此外，古人每每认为，人的悟性、才德状况乃至其一生的命运，一方一地的民情习俗的醇厚或浇漓，往往与其所在地的地气以及天气的衰旺情势有关。夫之也认同这一看法。不过，他通过对于这一看法的表述，隐约透露出了一种文明不断转移的可贵识见。他说：“天地之气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又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藪；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駘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今且两粤、滇、黔渐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风俗人心益不忍问。地气南徙，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

彼文明，又何怪乎！”（《外篇》2.78）

在阐发上述观点的同时，夫之也对与这些观点相左的佛、道两家及其他相关各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乃至抨击。

除了以上所提及者外，夫之还针对天文、地理、历法、音律、医学、易学，以及包括礼法在内的社会的政道与治道等领域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篇幅所限，不再赘言，其详则请阅本书之注译。

本书注译所依据的《思问录》版本，是王伯祥校点、中华书局 1956 年 9 月出版的《思问录·俟解》本，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版本，尤其是岳麓书社版《船山全书》本（《思问录》在该《全书》本的第十二册）。为阅读的方便，本书对正文的每一章都加了题号。本书的《引言》、内篇之注译由王新春撰写，外篇的注译则由刘心明撰写。

目 录



引言	/001/
思问录内篇	/001/
思问录外篇	/269/
后记	/393/

思问录内篇

